凭窗读史

额济纳道路(范长江摄)

20世纪30年代的范长江。

为什么是范长江?

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叫“长江韬奋奖”,为什么是范长江?大家只要看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就不会有疑问了,或者我们从范长江的生平也可以看到一个大概原因。

三进三出大学的求知者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少年范长江以优异的成绩在家乡完成中小学学业。1927年,报考黄埔军校意外落榜,旋即进入由后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立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后因重庆“三·三一惨案”,离川加入当时贺龙部的国民革命军学生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这是他的第一次大学经历。

1928年下半年,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名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在校时学习了多种政治理论,但因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与不抵抗政策等的不满,1931年退学。1932年秋,度过了大半年半工半读艰苦生活的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两个问题时常让他困惑与彷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他向教授提问,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

现实问题不能在学校中得到解答,范长江毅然离开学校,参加劳军,并在这之后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撰写通讯文章。

中国的西北角:迫切要求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西北角》是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旅行的通讯合集。他在行程中生动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时局状况,描写了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民风民俗等诸多问题,揭示了当时国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民族压迫等问题。其深入的分析和独到见解大大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民众,促使社会各界开始深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这批通讯文风质朴优美,还展露了他的深厚学养,如“岷河沿岸”一小节,修正了《辞源》误岷河为白龙江的错误。

尤为难得的是,他将西南与西北的现状放在世界大范围内进行考察,揭示其在战争中的严重性,加之早前对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持论有理有据,振聋发聩地引起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早早展示了青年范长江的新闻职业素养与抱负格局。

中国新闻史泰斗方汉奇先生在为《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撰写序言中评述说,《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保存了那个时代中国西部极其珍贵的真实历史记录,而在新闻写作方面,则在当时和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新闻通讯的典范,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新闻工作者。

塞上行:开启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关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只身进入西安,1937年2月4日,在西安采访了周恩来。9日,范长江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在窑洞里与他做竟夜长谈,就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一作了精辟分析。范长江被深深地折服,希望能留在陕北学习和工作。毛泽东却建议他赶紧回到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范长江回到上海后,撰写出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讯,赶在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际,披露了西安事变真相,正面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3月29日,也就是回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后,范长江收到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看过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7月《塞上行》出版发行,至11月连印六版。本书第一次向世人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透露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同年年底,范长江在上海与同业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此后,范长江由于与《大公报》负责人在国家政治前途和新闻理念上产生分歧等多方面的原因,脱离《大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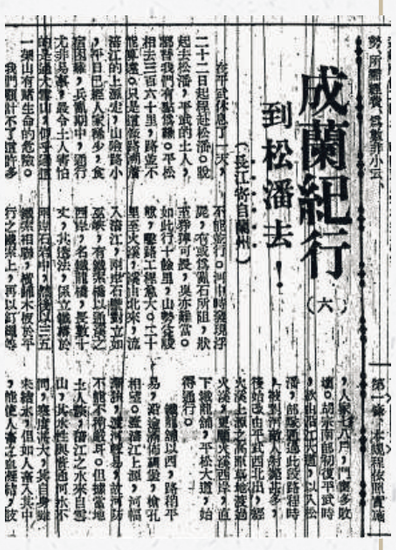
可以说,肇始于范长江的新闻通讯形成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后来包括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大批国际记者对报道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革命与变化的热情。这系列的新闻通讯为改变美国及盟友对中国红军的看法与对华政策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人民之战》的作者爱泼斯坦在《永远怀念长江同志》中说“……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

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中期,范长江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也坚定和清晰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此后十余年中,他在祖国各地辗转,撰写了大量文章报道中国共产党,以至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电,要求严密监视范长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人,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城,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先后历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直至1952年开始担任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才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但对新闻事业的关注却从未改变。

范长江近五十年前对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如“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日仍未过时。



成蘭紀行(六)

到松潘去!

(長江岸自蘭州)

《大公报》刊登的《成兰纪行》。

2024年,北京出版社“文津书馆”出版了由范长江先生之子范东升教授亲自勘注增补的《中国的西北角》,对当年这一系列新闻通讯进行版本勘校、订正讹误,并增补佚文。不仅收录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书原版包括的所有文章,还补充收录了同期内容相关的其他作品,包括范长江1935年9月至12月撰写的关于红军与长征的七篇文章,以及在同期发表的《伟大的青海》等多篇时评。并在附录《范长江西北考察行程一览表》、《范长江生平大事记》《〈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版本学研究初探》、《范长江西北考察通讯中的政治性用语疑点辨析》等文章中,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依据史实资料,以版本学的角度,尽力还原出了范长江先生这些影响当时战局并泽被后世的新闻通讯文章的面貌。

《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等通讯是中国新闻史的经典作品,充满了范长江这位中国新闻事业先驱的真知灼识和预见。勘注增补版的价值,用中新社评论的话来说:范东升教授将版本学、校勘学引入对新闻史的研究,不仅是做了创新的工作,也让读者看到了版本流变背后中国新闻学发展与时势变迁的轨迹。

王绍君

《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
范长江 著 范东升 编 北京出版社

徐悲鸿廖静文北平住所补遗

前不久,由廖静文公益基金、戴泽艺术基金主办的“回首风尘甘息机——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展出了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之间的信笺、手稿二十余件,其时间集中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最后的人生岁月。

从1946年徐悲鸿北上创办北平艺专,到1953年徐悲鸿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留下了深厚的印记。

根据很多资料记载,徐悲鸿偕廖静文到北平(1949年9月27日更名为北京)后的第一住处就是东裱褙胡同22号。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上,廖静文在一张照片上记录的住址,为研究他们在北平的住处提供了新的线索。

廖静文为“庆平生十日之影”题记。

东裱褙胡同的新客人

1982年2月,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完成《徐悲鸿的一生》的写作。书中讲述了徐悲鸿1946年春夏之际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并与她从重庆经南京、上海赴北平就任并安家的前后情况。

徐氏夫妇在沪期间看望郭沫若时巧遇周恩来。周恩来对徐氏夫妇北上办校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书中写道:

> 就在我们将要走出郭老的客厅时,周恩来同志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听说悲鸿要去北平,他立即兴致勃勃地说:“好呵,应当去!”他满含笑容对悲鸿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
> 之后不久,悲鸿和我便离开了上海,乘轮船至秦皇岛,转乘火车,前往北平。
>
>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悲鸿和我到达北平。
>
> 我们初到北平时,租住了东裱褙胡同二十二号的东西厢房。房屋的主人住在北屋。他们有时邀人打麻将,打到深夜,夜阑人静之际,客人散去时,一片喧嚣,吵得我们不得安眠。
>
> 我因跑来跑去,想寻找合适的房屋,以致劳累过度,于这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产,生下了我那个不足月的男孩小鸿。直到这年年底,我们才租到小椿树胡同九号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房子,搬了进去。

需要指出的是,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指出廖女士书中所记徐悲鸿一行抵达北平的时间有误,实为1946年7月31日。

徐悲鸿夫妇抵达北平后的安家情况,据经手人之一宋步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文回忆:

> 遵先生所嘱,我迅即赴北平,做些准备工作。此时,我又收到徐先生的手书,写道:“我等六人将于廿四日晨乘轮至秦皇岛,廿六日夜约能抵平,至迟廿七日能到,请兄设法至王府井梯子胡同一号,询盛成先生得一暂时落脚之处。”同时又介绍了先生的老友寿石工先生,让我前去联系。我找到寿石工先生,为徐先生一行安排了住处。
>
> 徐先生和吴作人先生一行六人到北平后,住在简陋的房舍。(宋步云:《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可惜,宋先生的回忆里并未给出徐悲鸿一行抵平后住处的具体地址。2023年第11期《美术》刊载了美术史学者曹庆晖《洋溢胡同王临乙家——家园、家居和影集内外的艺术生活史(1946—1994)》一文,文中写道:

> 1946年7月31日,徐悲鸿夫妇与吴作人、李宗津等一行6人由上海乘船到秦皇岛再转火车抵达北京。事前受徐悲鸿函约已先行到北京的画家宋步云,通过与徐悲鸿书信引荐的朋友联系,为徐悲鸿夫妇租住了可暂时落脚的东裱褙胡同22号。待徐悲鸿8月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复员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即聘宋步云为副教授兼事务组长,嘱其设法廉价购置房屋以解决教职员的生活必需……很快就在洋溢胡同租住了14号院与47号院。这样,先行到北京的吴作人以及宋步云、李宗津两家,不久都住进了洋溢胡同14号。

笔者所知,1947年秋,徐悲鸿自己用卖画的钱买下了东受禄街16号,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在搬离最初的落脚地东裱褙胡同22号后,租住将近一年的小椿树胡同9号的院墙又倒坍了,而此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11月就要出生,因此买房成为他们一家必须考虑的生活问题。

综上所记,1946年7月底徐悲鸿一家抵京后,首先居住在由寿石工、宋步云等人代为租赁的临时落脚点东裱褙胡同22号。同年底,全家迁往小椿树胡同9号。1947年秋,买下东受禄街16号,并最终安家于此。

廖静文写下“东裱褙胡同廿号”

前段时间,笔者在“回首风尘甘息机——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上,在一组老照片的题记中有了意外的发现。

三张照片在一纸影集册页之上,为徐氏夫妇长子徐庆平先生出生十日时的留影照,拍摄于1946年10月7日,影集册页右侧空白处为廖静文女士用钢笔亲笔题写,内容为:

> 庆平生十日之影。舒泽湖君摄。时居北平东裱褙胡同廿号。静文记。

该组照片拍摄者舒泽湖,是徐悲鸿一生挚友,是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海》主编舒新城先生长子,曾长期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过教育部“全国电化教育课程编审组”成员。

该组照片拍摄时,廖女士初为人母,她一定是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郑重记录下这一时刻,故照片上的题记内容,写错的可能性不大,“东裱褙胡同廿号”使得这组照片极具史料价值。

笔者推测,或许是东裱褙胡同22号居住条件无法满足徐氏一家人的需求,徐氏夫妇很可能是在1946年8月搬至相隔咫尺的东裱褙胡同20号居住。不久,他们便在这里迎来了首个孩子的诞生。

1946年前后朱启钤住在东裱褙胡同

关于东裱褙胡同20号的情况,笔者查阅史料,又一次有了惊喜发现。原来,当时在此院落居住的居然是声名显赫的朱启钤先生。

朱先生1872年11月生于河南信阳,祖籍贵州开阳,字桂辛,号蠖公、蠖园,人称桂老。中国近现代政治家、实业家、建筑史学家、工艺美术家。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在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他对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包括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开发王府井大街,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以及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等。

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周恩来多次前往其家中访问。1964年朱先生病逝,终年92岁。有《朱启钤著作集》十八卷传世。

1962年至1964年任朱启钤秘书的刘宗汉先生在《有关朱启钤先生史料的几点补正》一文中记述:

> 为了写作此文,我先后请教了朱先生的六女儿朱洛筠女士、四孙朱文槼先生、六孙朱文相先生和长子朱沛先生的友人陈世廉先生……
>
> 1937年北京沦陷……日伪政权以低价强行征购了朱先生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和家具。朱先生被迫迁居东城区东总部胡同75号,后又迁居东城东裱褙胡同20号。朱先生在东裱褙胡同一直住到北京解放前夕去上海。

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日)古屋数一编辑,北京中央电话局1944年7月发行的《北京电话番号簿》,在第42页上查到一条信息:“朱宅:5-1240 东裱褙胡同二0”,说明此时朱桂老已经搬至东裱褙胡同20号居住。

王世襄的长文《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也有相关记载,据王先生回忆:

>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止,约一年的时期内,我在平、津清理文物。
>
> 朱桂老同我家夙有交往……到北平不久我曾去东裱褙胡同看桂老,他对我参与的清理文物工作表示出极大关怀和兴趣。当我为“杨铜”和“郭瓷”的事感到苦闷的时候,想到了应当去向桂老请教,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去到他家。桂老听明了我的来意后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要来看我,你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到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
> 我按照桂老的吩咐办理了。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当晚桂老找张重威和郭昭俊到东裱褙胡同,嘱咐郭立即准备一个呈文,由张送给宋子文。

老一代外交家章文晋在《回忆外祖父朱启钤》一文中亦谈及,1946年春作为周恩来秘书,他曾跟随周恩来赴北平公干。其间,周恩来叮嘱他一定要回家看望朱桂老。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抽出时间看望了外祖父,老人家非常高兴。

综合以上史料,朱启钤先生1946年前后正在北平,且居住的东裱褙胡同20号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笔者猜测,1946年,徐悲鸿夫妇抵平后租住的东裱褙胡同22号条件无法达到徐氏夫妇预期,考虑到重组国立艺专事务繁重,徐悲鸿一时难以分身,况且初来乍到,廖女士又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不宜兴师动众。朱桂老的住处恰好与其比邻,条件良好,于是徐氏夫妇选择临时借住到朱宅。

未见徐悲鸿与朱启钤交往的记载

在东裱褙胡同20号,当时的社会名流朱启钤与徐悲鸿,彼此应该少不了来往。笔者在查阅李松《徐悲鸿年谱》、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以及多本徐悲鸿传记等著述后,却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徐悲鸿在1917年至1919年被北京大学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在北平生活近两年。十多年后,徐悲鸿于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再次在北平生活一年多,但并未发现徐悲鸿与朱桂老的交往痕迹,甚至也未见1946年徐悲鸿一家暂居东裱褙胡同20号的任何记载。

而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廖静文女士在撰写《徐悲鸿的一生》时,也未将此段经历写入书中。这是为何?由于当事人均已故去,笔者无法得出明确答案。不过,笔者分析或者有以下两种可能:

其一,人物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形式,其写作视角往往会有所侧重,在史料运用方面亦会有所取舍。现在存世的两种徐氏年谱,在徐氏不同时期居所问题上也未给予过多关注,在此方面尚存较多空白。

其二,廖女士写毕该书的时间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当时受历史原因的影响,社会各界对于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认知整体上尚持反面看法,抑或唯恐避之不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直到上世纪八十代末期才逐渐有所改变,趋于客观公正。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朱桂老在内。

如今,东裱褙胡同唯有东端的古观象台完整保留下来。人们已然无法细致地探访近八十年以前曾经的这段尘封往事。但笔者仍然希望通过本文的新发现、新线索,能够对于朱启钤和徐悲鸿这两位近现代杰出历史人物的研究有所补充。

李仲民